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批判范式解读

——以卡莱尔·科西克为例

程广丽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科西克以其独特的思想资源作为支撑,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了文化批判范式的解读,形成了具有浓厚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观。立足于实践人本主义的审视维度,科西克眼中的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成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它指向一种主体性批判向度的日常生活批判,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历史性社会实践,因此在根本上属于海德格尔式的生存哲学。

关键词 实践 科西克 文化批判范式 历史唯物主义

程广丽,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210023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解读。其中,以文化批判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研究,是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热衷的理论课题。整体来看,他们的理论努力在基本问题领域上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在客观上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路来审视这一阐释模式,其研究思路是很有局限和问题的。基于此,本文以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的学术研究为例,来探讨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批判方式解读的理论效应及其现实后果。

一、科西克谈马克思实践概念:特征、种类与后果

科西克认为,哲学的天职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真正的哲学不应该将其逻辑起点定位于某种关于人的生存的理论的研究,而应该着眼于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将人在世界上的实际生存状况作为研究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就必须“向存在开放”,以“实践”作为中介,在人们获得关于实践的正确认识下恢复自身。科西克指出:“人的意识既是‘反映’,又是‘设计’;它记录,也构造和计划,它既反映也预期,既是感受的,也是能动的。让‘事物本身’表达自己,不附加任何东西,只是让事物按其本来面目存在——这需要一种特殊的活动”^[1]。在实践的基础上人得以创造世界,然而人的理解总是会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4BZX010);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编号:2014SKYY03)。

[1][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将宇宙或自然的“总体性”包含进来。一旦人对自己的存在以及他自身对于存在的作用达到一种充分的理解与领悟时,人就等于实现了自身,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首先,人们的生活实践具有虚假的性质。立足于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辩证关系,科西克首先将实践置于运动的过程当中。在对“伪具体的世界”概念的揭示中,科西克深刻地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进行了刻画,指出在现实的人的生活实践中,“充塞着人类生活平日环境和惯常氛围的现象集合,构成伪具体的世界。这些现象以其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渗透到行动着的个人的意识中,并获得了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1]。在感性实践活动的层面,实际上盛行的是一种拜物教化的实践。科西克指出,拜物教化的实践是一种异化的实践,因为它是一种“跟革命的批判的人类世界是不同的”^[2]实践。这个拜物教化的世界是纷呈于真实本质过程表面的外部现象世界。科西克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系统,一个由无意识主体(价值)的运动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从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剥削他人劳作的系统,表现为一个大规模地再生产自身的系统,亦即一个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的机构。资本主义是一个总体物象化和异化的动力系统。”^[3]他极力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和生活世界的描述,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判断是极为准确的,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活“物的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客观的人类实在世界。这也是辩证法的魅力之所在,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则是一种非批判的思维,它分割现象与本质的内在关系,把伪具体世界视为一种自然的、自主的和独立的存在,且将这一存在视为真实的存在,因而是错误的。

因此,人们的生活实践具有两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与拜物教化实践。相应的,人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第一种实践联系着的思维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或具体的思维。由于“拜物教的实践”或功利主义的实践是一种异化了的实践,因而“是历史地决定了的片面的和残缺不全的个人实践,是以劳动分工、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地位等级制为基础的”^[4]实践。与这种实践相联系与相适应的思维则是一种日常的、“伪具体”的思维。与辩证的、批判的思维方式相比,这种思维往往把认识局限在事物的直观表象上,并且把直接解读到的那个世界当作一个“亲近”、“信任”和“熟识”的世界来对待。在客观表现上,拜物教化的实践表征着人的异化,从而充斥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那个物象化了的伪具体世界,人的对象化活动及其结果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己性。例如,商品、货币等原本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在客观上表现出一种自在、自主的状态,从而支配和统治着作为主体的人,并使人产生拜物教的观念,最终从主体沦落为客体的存在。因此,要想恢复自己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将客体的地位彻底摧毁,消除伪具体世界的统治,揭露“物假扮人”的社会现实,戳穿现象假扮本质的异化生活,使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世界得以还原,重新确立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

再次,人们生活实践的虚假性融合于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对于什么是“伪具体世界”,科西克以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层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由现象与本质共同构成的内容:“伪具体的世界是一副真理与欺骗互相映衬的图画。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现象在显露本质的同时也在掩盖着本质。本质在现象中显现自己,但是,它仅仅显现到一定程度,仅仅显现出某些方面和侧面,现象指示出来某些超出它自身的东西,它只有依赖于自己的对立面才得以存在。……现象世界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绝对的东西,现象是在与本质的联系中构成现象世界的。”^[5]也就是说,本质与现象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关联性的,且在这种关联性中,本质与现象都是有

[1][2][3][4][5] [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第2页,第137页,第2页,第3页。

着各种的能动性,就在他们各自的能动性作用下,真理得以实现,人也就在成为人的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因此,人们生活的实践是一个需要超越的实践。因为日常生活的“伪具体”的虚假特性,它最终必将被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所取代。在科西克看来,处于本体地位的“伪具体”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实践,是一个没有反思在内的虚假世界,要想真正还原人的真实面目,使人所具有的“现成的实在”的东西得以恢复,就必须对伪具体世界进行彻底的摧毁,以建构出“具体实在”的真实世界来。“摧毁伪具体有下列几种方式:(1)以人类的革命-批判实践来摧毁。这个实践与人的人化过程同一,而社会革命是它的关键阶段。(2)以辩证思维来摧毁。辩证思维溶解拜物教化的形相世界,以透视实在和‘物自体’。(3)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因为,真理的世界也是作为社会实在的每个人类个体自己的个人创造。每个人都必须去占有他自己的文化,他必须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1]

综上所述,人之所以能够把握事物,是因为在实践活动中,事物展现着自身,在实践的中介中生产和展开着真实的实在。后来的海德格尔将哲学的核心问题汇聚在对“存在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上,强调“此在”不是传统哲学中的那个抽象的存在,而是处于具体社会生活情境下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存在。科西克深受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也将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和实践的方式来对待。在他看来,人类实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实践的世界,“为了窥见异化了的平日之真情,人们必须与它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取消它的熟识性,人们必须对它施行‘强制’”^[2],让那个我们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再度“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起来。也正是因为人的实践活动能够使具体总体得以生成,所以人便自然成为社会实在的构造者,人也是能够从根本上获得对社会实在的认识。这种认识能力能够将人从伪具体世界和操持世界中解救出来,重新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合理地建构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最终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解放的目的。“主体解放”不是指拜物教式的“直接”活动,而是指人对社会实在的具体的反思与批判;“客体解放”则指向对资本主义社会伪具体性的揭露,从而超越和消除这一异化世界,构造和生产出一个合理可期的美好社会状态。

二、科西克与马克思在实践概念理解上的同与异

为了更加清晰地弄清楚科西克实践概念的内涵以及其遵循的文化批判理论范式的研究路径,需要回到马克思实践概念,将二者加以比较和鉴别。

首先,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实践也是一个由虚假性构建起来的现象化的拜物教的世界。“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观念中,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藏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3]。但是,与科西克眼中的拜物教化的“形相”世界不同的是,马克思眼中的这个异化的拜物教世界是深深根植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当中的。从根本上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一种将哲学引向神秘主义去的神秘活动,它

[1][2][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第59-6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关注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状态和生存活动本身,最终将唯心主义关于意识与生活的关系彻底颠倒了过来。

其次,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实践也是一个由现象与本质的辩证统一所构成的世界。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实践”的理论地位,指出实践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当中的概念,它具有革命的和批判的功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实践的内涵又进一步向前进行了推进。指出,要想获得对实践的深刻认识,必须将其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理论层面。科西克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视为一个近代的产物,并且认为,实践的本质与普遍性在于对人的秘密的揭露,正是在实践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在,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即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1]。实践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人在这种能动的、历史性的自我生产过程中进行着关于自我的生产,从而“不断建立起来的人与世界、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产品与生产能力的统一”^[2]。应该说,科西克对实践的特征的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对于人的实践的描述是一种严重脱离社会历史语境的认识,因此带有明显的抽象意味。甚至于说,科西克最后干脆直接将实践当作是一种关于人的“精神”维度的再生产的概念来对待了:“人的存在就是社会-人类进程与超人类实在以特殊方式接触和冲突的所在。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的存在以社会-实在的实践性生产,和人类实在、超人类实在乃至一般实在的精神上的再生产为基本特征”^[3]。这竟然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施蒂纳有着惊人的相似。

最后,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由虚假性所建构起来的现象世界是一个需要依赖于“实践”才能摧毁的世界。面对资本主义这个颠倒的虚假世界,实践必然迫使工人行动起来,来摧毁这个不公正的世界:“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们才感到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4]换言之,要想准确认识并彻底摧毁这个异化了的拜物教世界,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理解。“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5]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过渡性的、中介的概念,它指向革命的、批判的实践。

科西克认为,只要人们从观念、现实以及表现三个方面出发来对伪具体世界进行摧毁,人的异化就会得以消除,本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就会得以回归。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存在主义意味的思辨辩证法。甚至可以说,科西克的“革命-批判实践”是一种“存在主义加上马克思”的革命观,他试图糅合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科西克将摧毁伪具体世界的最终希望寄托于真理的实现与人类实在的生产上,这从根本上看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方法,一种典型的理论上的价值预设。与此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从根本上说,“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7]。马克思以无可辩驳的理论逻辑论证了“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8]的社会现实。

[1][2][3][捷克]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第171页,第1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6][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第214页,第263页。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明确指出说：“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毫无共同点”^[1]。但是，在科西克那里，无论是实践概念的产生还是异化实践的摧毁，都是从“人”出发的。他从“哲学”到“哲学”，从抽象到抽象，将阐述的重点放在“伪具体世界”摧毁的几种方式上。殊不知，人类整体的实践活动是不能脱离马克思所说的“一定社会的经济时期”的，因而可以说，虽然科西克区分了两种根本的实践形式也即拜物教化的实践和“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但是从根本上说，他只是对此进行了区分，却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两种实践的真正区别是什么，或者说，马克思眼中的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的真正含义他是无法理解的。可以这样认为，致力于对人的异化的深入透视与超越，科西克将实践作为自己建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然而，由于他在根本上丢失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原则，在客观上将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的基本逻辑忽视和否定掉了，这样一来，马克思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理论被抽空掉了，成为一种抽象化的概念空壳而没有分量地存在着。

三、实践概念的文化批判范式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范式？

立足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客观现实，马克思将人看作是处于现实的历史实践中的具体的存在，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要批判方式，来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客观现实，从而将资本对人的劳动的非人道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阐释的淋漓尽致。也就是说，马克思也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现状与真实的客观实践来批判异化，但是它并不是纯粹地陷入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话语当中来谈论人的异化问题，而是将揭示人的异化境遇的视野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维度来看待。即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异化境遇决不是孤立的，它是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阶级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要想获得关于人的异化的科学认识，就决不能仅仅就异化理论而谈论异化问题。但是，在科西克那里，虽然生产逻辑也是他的理论的出发点，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从他整体的着墨来看，科西克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则是致力于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以及工业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思维的束缚的强烈控诉。并且，他对于人的异化的状况的控诉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寻找到一条消除伪具体世界，从而使人回归本真性的存在状态上来。因此，科西克的带有浓烈生存论意味的实践，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也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的那个关于社会历史的基础和本体而存在、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包括交往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生产实践是异质的。

究其原因，科西克的“抽象”方法是一种缺失了“历史具体”的抽象，不是马克思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科学抽象，因而无法具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性质。科西克虽然将马克思辩证法解读为一种关于总体的辩证法，希望通过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以弥补和重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但是由于其经验主义方法论的运用，导致了其理论的科学性质。因此，“从文化批判角度切入的戏份马克思主义者就会在假想出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已经没有内在矛盾的前提下，专注于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外在的批判”^[2]。科西克的总体性文化策略是一种抽空了社会物质根基的、重返人的本真性存在的“文化构想”，是一种理性化的、乐观的乌托邦构想与“空中楼阁”。虽然科西克也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但其批判主题更多地集中于文化层面，他们致力于揭示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文化力量从人之创造物转化为统治者、消解人之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

[2]唐正东：《资本的附魅及其哲学解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体性的异化力量的状况。缺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科西克的人本主义现象学逻辑的思想力量必然会得到极大程度的减弱。它只能局限于“哲学”的抽象层面上看待问题,无法实施到现实的社会实践当中,进而对人的现实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作用。无怪乎伽达默尔会说:“近代社会发展起来的‘实践’概念是对实践真正所是的一种可怕歪曲。”^[1]

在马克思还在世的年代,面对种种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说:“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2]科西克坚持以“实践(Practice)”的视角来理解人的存在,坚持将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解读为一种实践活动的生成性存在,然而它却抽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分析话语或者文化哲学来对待,因而失却了历史现象学的维度,无法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终究不能逃脱人本主义逻辑的框架。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弱化或放弃经济批判线索的前提下展开单方面的文化批判线索,不管是对文化工业或文化霸权的批判,还是对‘科学’相对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都潜藏着一个理论前提: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线索中已经无法生成批判理论的思想动力了”^[3]。仅仅拘囿于文化批判范式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解读,“自然不会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之所以受到某些话语权力的束缚,不只是因为这些话语本身具有某种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产生这些话语的现实土壤。……观念拜物教的背后所隐藏的,是物质拜物教的客观现实。因此,仅通过对话语权力的批判,而不注重对物质拜物教关系的消解,是不可能真正使人获得发展的。”^[4]

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以文化批判范式为立足点来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探讨和研究,在客观上带来双重的理论效应:虽然这一解读模式带来了实践概念本身的认识的深化,但同时也在根本上使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发生了偏移,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从更深层次上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跨越了历史唯心主义所实现的现实效应,是一种哲学范式的重大转变。马克思哲学拒绝纠缠于对“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纯粹理性的思辨上,而诉求一种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践活动。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彻底批判,穿透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虚幻面纱,为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确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根基。在他看来,人的现实的实践运动是一个处于现实境况下的能动的生活过程,而只要能够真实地描绘出这一过程,历史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集合,而不再是“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5]。历史哲学的空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的缺乏,导致科西克的实践概念畸变为一种没有根基的文化批判理论,在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我们可以接受以科西克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提出的问题域,但却不能接受他们的学术进路和致思路径。

[责任编辑:曾逸文]

[1][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3][4]唐正东:《资本的附魅及其哲学解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页,第6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